

地域分工与区位优势

杨 吾 扬 梁 进 社
(北京大学地理系)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提 要

地域分工和区位优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形成了区域开发或城市规划工作必须遵循的依据。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俄林和巴朗斯基的地域分工学说作了历史性回顾;然后,提出了区域和城镇区位优势表现的完整体系,包括以下四对即有形和无形优势、绝对和相对优势、局部和全局优势以及空间和时间优势;文章结尾探讨了地域分异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机制问题。

关键词 地域分工 区位优势 绝对利益 比较利益 相对价格 内在机制 外在因素

地域分工与区位优势往往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前者是客观图式,后者是人为动因。这是因为地域分工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空间形式,而人们往往是在具有某种优势的地区开展某种生产或经济活动。进而,它们之间还具有反馈关系。区域或城市的区位优势可以导致一定的地域分工,形成后的地域分工也会产生新的区位优势。不言而喻,有关研究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一、对地域分工国际上已有学说评价

十八世纪是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工场手工业看到了分工的利益。然后联系到整个社会,论证了地域分工。他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于某些特定产品生产的条件,而导致生产成本绝对低,这叫作绝对利益原则,又称绝对成本说。如每个国家均按此原则进行专门化生产,通过贸易进行交换,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是斯密地域分工学说的基石^[1]。

斯密的地域分工和绝对利益原则,是资本主义下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促进了世界性经济交流。他的学说对解释当时国际和区际的地域分工和生产布局,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的理论是有显著缺陷的,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地域间,由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均显著低于先进国家和地区,用绝对利益原则作指导,前者就只好闭关自守,避开同后者的经济交流了。这同以后

的生产力布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实况也是不一致的。

继斯密之后,另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了比较利益,或称为相对成本论的地域分工原则。他认为,如两个国家中的一个,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各种产品,两国间的地域分工和贸易也会使双方均为有利^[2]。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则比斯密的绝对利益原则,能较好地解释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问题。但他单用劳动时间来计算比较利益,并不全面,正如斯密主要从地区间自然条件的差异来解释地域分工一样。事实上,各地生产要素的结构和内在关系是复杂的,再加上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和保护国的经济控制,实际情况同他的理论分析,尚有很大差距。故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被称为国际贸易的纯理论。

本世纪,瑞典著名经济学家,197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俄林(Bertil Ohlin)把价格理论与一般均衡区位论结合起来,研究了地域分工,取得了较大进展。俄林认为,地区是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地域单元,全世界可划分为若干大地区,大区又可划分为亚地区,还可以逐级细划。他指出,从一国范围来看,国内各地区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国内贸易和各地工业区位的形成。从国际范围来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国际贸易和各国工业区位的形成。

俄林认为,在土地、劳力、资本三个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不能自由流动外,如果劳力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是古典区位论所讨论的局部均衡问题;但若三个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则生产要素价格比率的任何变化,使已有均衡关系破坏,导致新的均衡关系的形成,这就是一般均衡的区位问题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取决于其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财产占有情况、交通运输条件、经济和社会的安定程度以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等。生产要素分布不均,引起相对价格差异;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差异又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加上汇率因素,进而会引起商品绝对价格差异,最后导致区际贸易的产生,因此,绝对价格差异是贸易的直接原因^[3,4]。

俄林的价格差异地域分工学说,我们觉得其核心是相对价格差异。他把本地区内某商品各类生产要素之间价格的比例称为相对价格,如两地区各要素的价格比例不相同,则谓两地区具有相对价格差异;如相同,则为无差异。由于某商品的生产要素在各地会有相对价格差异,再加上其组合状况基本一致,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就会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生产要素,生产商品输出,同时输入那些本地需要稀缺的生产要素才能生产的商品。

按照相对价格差异的理论,很多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现象得以解释。作者认为,俄林有两大理论贡献。其一,他以相对价格差异学说,补充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论,成为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其二,他在以局部均衡为基础的特殊区位论基础上,引入区际价格差异理论,创立了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一般区位论。尽管特殊区位论仍然是区位论的主体,而且在动态化和非均质化方面已在发展,但毋庸置疑,一般区位论在区域研究和生产力宏观布局方面,还是会发挥其独特作用的。

俄林的学说也有一些争论之处。按照俄林的学说,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利,就必然要出口那些本国优势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列昂节夫(Wassily W. Leontief)为了验证俄林模型,对美国主要进出口商品的要素密度进行测算。却发现,美国这样一个公认资本比

劳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进口货物比出口货物的资本密度要高,出口货物比进口货物的劳动密度要高。这与俄林的学说不符的。为此,出现了自然资源论、人类技能贸易论、产品生命周期论等,实质上还是对俄林学说的补充。^[10]

苏联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巴朗斯基(Н. Н. Барански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地域分工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地理分工论^[11]。他认为,所谓地理分工就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有两种情形:一是某国家或地区不能生产某种商品,而由另一国家或地区输入;另一是某国家或地区虽能生产某种产品,但成本较高,因而输入这种产品。巴氏称前者为绝对地理分工,后者为相对地理分工。可见,他概括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理分工和国际贸易学说。

巴朗斯基指出,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有两个原有的因素,即人们本身的差异和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差异。前者最初只发生于家族和氏族的内部,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起作用,但它不能在地理上表现出来。后者最早是家族、氏族和公社间,在十分广阔的基础上发展的。最初只源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后来又加进去了经济和技术因素。地理分工的纵深发展,从古代旧大陆的沿海贸易和东西方的商队往来,到地理大发现时期世界范围的海上交往,再到工业革命后因大陆铁路的兴建,从而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这时,地理分工摧毁了各地自然经济,包揽了几乎所有新的经济部门,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以城市为中心,联系周围农业的经济地理结构,形成了联系广泛的世界市场。

他认为仅考虑自然界在当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地球表面已积累了大量的差异,它们同地面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生了根。生产成本不单取决于原料与燃料,还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水平,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数质量。此外,地理分工与社会结构的差别也有关系。

巴朗斯基指出,经济利益是地理分工发展的动力。但是,他沿袭了斯密的绝对利益原则,认为地区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就是两个地方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当然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则后退了一步,比俄林的相对价格差异学说更显得肤浅了。他的过于古典的地理分工论,在其经济动力方面,不仅对当代国际分工的现象无法解释,就是苏联内部地区分工与专业化的现实,也不一定符合这种绝对的经济利益。

然而,巴朗斯基的地理分工公式是正确的,即 $C_a > C_p + t(C_a, C_p$ 分别为两地某商品价格, t 为运费)。从微观分析来看,这既符合李嘉图或俄林的学说,也是古典区位论的基本原则。

巴朗斯基对运输和关税在地理分工中的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引起了运费下降,扩大了地理分工的广度与深度。而因地理分工而获得的利益,又使更多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交通事业。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价值往往具有相当规模,有时(如美国在二十年代初)甚至超过了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关税是干涉地理分工的超经济因素。由于增加了上述不等式的后部分,地理分工的规模会相应缩小。地理分工的发展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税则成为这种提高的阻力。但是,一般地反对保护关税,对落后国家特别不利,因为较先进国家的竞争,使落后国家无法将其经济发展巨大潜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二、四对区位优势

所谓区位优势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展某种生产或产业,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所具有的优越条件。从成因上看,有自然的、人文的,以及自然与人类共同作用形成的。从地域分工的观点来看,则主要有以下四对。

1. 有形区位优势与无形区位优势

每个区域或城市都具有一定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和邮电网络、市政设施等。这些构成了区域或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即“硬件”成份。它们对特定区域或城市的已有面貌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在考虑未来发展时,必须从上述现状出发。优势部门的确定,往往成为规划工作选择突破口的首选。这种区位优势称为有形区位优势。另一方面,有些非物质的“软件”成份,如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经营传统、劳动者技艺的高低、科教机构的状况、信息传递的方便程度、对外联系的广度和方向等,也往往对区域或城市未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其中的某一方面,很可能是一种优势,我们称之为无形区位优势。许多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两种优势兼而有之。如上海、北京、天津,但表现的方式和方向可以不同。沪、津以部门齐全的工业结构和劳动者技艺高超结合见长,发展高精尖产品具有有利条件。北京则以后期发展的基础工业和发达的科研、文教与信息相配合为特点,应以中间实验,推广新技术应用为方向。又比如绍兴创制我国第一批精集成电路板,胜芳经营手工精致出口产品,更不是倚仗其有形区位优势,而是其无形区位优势。

2. 绝对区位优势和相对区位优势

绝对区位优势是指在一个区域或城市,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其劳动生产率较另一个区域或城市要高(或成本要低)。现以天津和呼和浩特为例。天津的棉纺织品成本低于呼和浩特,而呼和浩特的乳制品成本则低于天津,这样就说天津在棉纺织品方面居绝对优势,而呼和浩特在乳制品方面居于绝对优势。两个区域或城市根据绝对区位优势进行产品交换,对组成合理的地域分工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全国有许多区域和城市,不能仅让具有绝对优势的地方生产某一产品,而且这样也造成过分专门化和长途运输。于是,还应从相对区位优势出发,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相对区位优势不是拿某种产品的成本仅同外区或外城市比,而且还要与本区或本城市的其它产品比。假设棉织品和毛织品的成本,天津均低于呼和浩特。生产1m棉布的成本,在天津是0.6元,呼和浩特是1.5元;而生产1m毛呢的成本,在天津是7元,呼和浩特是12元。由于二地棉布成本之比大于一倍,而毛呢小于1倍,故呼和浩特还是具有生产毛织品的相对区位优势。

我们说,仅考虑这些是不够的,还应考虑空间因素,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方面。当然,在以上两类优势中已包括了某些运输成本,主要是厂内运输和某些中间产品运输,但在我们论证的这一级别生产水平上进行地域分工,将运输成本包括进去是应该的。此后仍有绝对和相对之分。

设某大区有 m 个子区域或城市,区内产品有 n 种,第 i 个子区域或城市生产第 k 种产品的成本是 C_i^k ,其产品效用是 U_i^k (即单位产品的有用量,如1kg动力煤的发热

量, 机器零件的使用寿命等), 第 i 个子区域运输第 k 种单位产品到第 j 个子区域所需的运费是 $T_{ij}^{(k)}$ 。

式子 $E_{ij}^{(k)} = \frac{C_i^{(k)} + T_{ij}^{(k)}}{U_j^{(k)}}$ 表示 i 区域的第 k 种产品在第 j 个区域的销售成本, 它也可

可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一种间接表示法。如果第 i 个区域或城市不能生产第 k 种产品, 则给 $C_i^{(k)}$ 一个很大的数, $U_j^{(k)}$ 一个很小的数, 表示该区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极高, 产品效用极低。这样, 就可以得到一个立体资料阵。

对每一给定的 k 与 j , 变数 i 可以确定一维数组 $E_{ij}^{(k)} (i = 1, 2, \dots, m)$, 如将其从小到大排序, 并赋予序号, 则得到绝对区位优势序列。它可帮助认识在第 j 个区域或城市销售第 k 种产品各产地的绝对区位优势状况。

对给定的 i 和 j , 变数 k 可确定两个一维数组 $E_{ij}^{(k)}$ 和 $E_{ij}^{(k)} (k = 1, 2, \dots, n)$, 取

$$\tilde{E}_{ij}^{(k)} = \frac{E_{ij}^{(k)}}{E_{ij}^{(k)}} \quad k = 1, 2, \dots, n$$

则 $\tilde{E}_{ij}^{(k)}$ 显示了 i 区较之 j 区的相对区位优势。 $\tilde{E}_{ij}^{(k)}$ 越小, 则说明其发展第 k 种产品的相对区位优势越大。

必须指出, 将优势变成现实受到巴朗斯基公式的制约, 因为它不单是生产成本相比较的问题。

3. 局部区位优势与全局区位优势

局部和全局区位优势是相对于系统的不同层次而言的, 前者对应于较低的层次, 后者则对应于较高的层次。如山西省的煤炭资源, 若从其数量质量、大地理位置、小地理位置、地质赋存条件、所在地经济基础等五个方面来评价, 山西煤炭基地与全国其它煤炭基地相比, 在前三项均具有绝对优势, 后两项则不具有绝对优势, 但将这五个方面综合考虑, 从较高的层次看, 山西省煤炭基地则具有全局绝对区位优势。

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较好地发挥局部与全局优势, 是区域规划的重要任务。我们说, 空间地域单元是具有等级序列的, 上一层次的区域如被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 下一层次的就是其子系统。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反馈关系。如广西梧州市, 有少数几个生产部门有较显著的经济效益, 象淀粉生产、松脂加工、豆浆晶序列产品等。但从整体工业来看, 较之东部沿海一些城市差距不小, 甚至还不如广西其它几个中等城市。可是, 梧州口岸在对港澳出口农畜土特产品, 特别是鲜活食品和立足本地资源的各级加工产品方面, 则有相对优势。甚至广西、云贵想发展对港澳贸易, 只有利用梧州口岸的相对优势, 别无良策。所以, 梧州的发展战略应是, 以对港澳出口和航运事业的发展为先导, 发挥其第三产业的优势, 带动其它产业, 逐步完善城市功能, 最终登上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宝座。另一方面, 梧州的真正兴旺, 也有赖于其它产业和其全局优势的提高, 以至梧州的吸引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西江经济带的建立。

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 各经济区经济是其子系统, 其下还可有进一步分的若干层次。如何使整体国民经济发挥它的优势, 同时各地区经济又能高速发展? 这叫做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它的许多方面是地理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课题。

须要指出的是,发挥局部与全局区位优势要受到投入产出模式的制约。对单个区域,其形式是^[6,7]:

$$(I - a)X = Y$$

其中

$$X = \begin{pmatrix} x_1 \\ x_2 \\ \vdots \\ x_s \end{pmatrix}, Y = \begin{pmatrix} y_1 \\ y_2 \\ \vdots \\ y_s \end{pmatrix}, a = \begin{pmatrix} a_{11}a_{12}\cdots a_{1s} \\ a_{21}a_{22}\cdots a_{2s} \\ \cdots\cdots\cdots \\ a_{s1}a_{s2}\cdots a_{ss} \end{pmatrix}$$

分别是总产出向量、最终需求向量和技术系数矩阵, I 是单位矩阵。

对多个区域,其形式是:

$$\sum_{j=1}^s a_{ij}^{(k)} \sum_{k=1}^n X_i^{kj} + Y_i^{(k)} = \sum_{k=1}^n X_i^{kj}$$

$$i = 1, 2, \dots, s; k = 1, 2, \dots, n.$$

其中, $a_{ij}^{(k)}$ 是第 k 个区域的技术系数, $Y_i^{(k)}$ 是最终需求, x_i^{kj} 是企业 i 在第 k 个区域生产的产品运往第 j 个区域的货物量,它可既用作中间需求,亦可作最终需求。

4. 空间区位优势与时间区位优势

前面讨论的是优势的空间方面。当代科学和社会实践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是在决定论与机会主义之间进行的。机会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对某个群体或对某一个体,在一定环境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间区位优势就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展某种生产或产业,开展某种经济活动的良好时机。人们常常强调莫失良机,可见抓住时间区位优势的重要性。

此外,在对区域或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时,不但要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合理布置,而且还应对其时间程序进行合理安排,才能使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达到优化。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经济水平和结构、环境和社会的容量均不同,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各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必须集中力量使某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或城市优先发展,同时保证其它区域或城市最终得到全面发展。这样,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就成为在时空系统中的立体战略。

比如,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港澳对土特产品的需求,以及梧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对梧州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时机。所以,梧州市在 1990 年前,应立足于本地资源和历史传统,以外贸和交通为先导,发展第三产业,带动食品、纺织、轻工生产,初步形成桂东南水陆交通、商业贸易和加工工业中心,为 90 年代西江阶梯开发后作为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奠定基础。随着西江中游西缘贵县,东头肇庆铁水转运站最后建成,西江航运线畅通,梧州市的工业体系有了轮廓,城市的扩散和接收力增强,吸引范围扩大,会起到区域工业生产的组织者,更大范围市场中心和沿海支援内地支撑点的作用。

时空区位优势的定量研究是十分困难的,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在探讨它。如英国的威尔逊 (A. G. Wilson), 比利时的艾伦 (P. M. Allen)^[9] 等人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前者的工作使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动态化,在突变论与分枝点理论的应用方面取得了成绩;后者使中心地论和空间相互作用模式结合并动态化,在社会发展的定律与历史的统一方面

取得了成就。可以预言,时空立体战略模式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将给生产力布局,人类居住系统的空间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地区差异的外在因素与内在机制

近代区域地理学十分重视地区差异的研究,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地理学就是关于地域分异的科学。反映在地域分工问题上,他们常常用差异性和一致性来探讨地球表面自然和人文现象的机制。这种解释是地理学的巨大进步,但难以避开重视外在因素,忽略内在机制的毛病。

历史的经验说明,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愈来愈复杂,其形式和功能在地域上的差异即不平衡性愈来愈大。巴朗斯基曾从历史过程予以解释,德籍美国经济学家、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舍费尔(F. Schaefer)也曾强调过用内在地域经济规律代换条件分析,来改进经济地理研究的必要。但总的看来,地区差异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分析,对地理学来说,主要还是在外在因素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包括苏联经济派学者在考虑生产方式对生产布局决定性影响的大量泛论在内。

从根本上讲,地域分工是由经济活动不断分化这一事实所导致,是具体经济过程内在机制决定的,在分化中人类得到了好处。图1仅是生产活动的分化演变略图,经济活动的演进显然更要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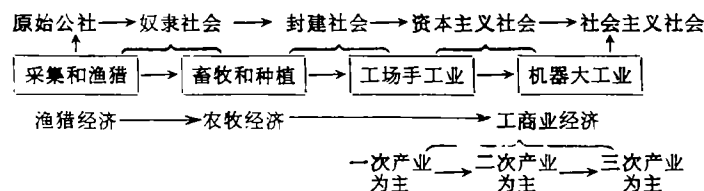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活动的演化及其共同生产方式、经济类型的关系

Fig. 1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production mode and economic pattern

即使在均质的大平原,一旦某一活动在一定地表空间进行,就会产生相应的区位优势,经过一系列反馈,形成空间分异。实质上,人类不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从使用工具开始,就将自然界当成了其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目前,从采掘业到最精密的计算机工业,自然界都还是作为环境和资源参与着。自然界先天的地域分异,被纳入了人类后天的地域分工之内,古今皆然,只是程度和方式有所变化。

地域分工使地球表层这个复合系统形成了形式多样、功能互异的单元(或子系统)。这样,就有了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和不同结构的地域分工,如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带,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城镇聚落等^[8]。每个单元都会按照自己的机制进行自组织,相互关联的单元又根据耦合与反馈,产生横向联系^[9]。区域的专门化和综合发展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就是不同层次经济地域系统走向有序化基础上,各地区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巴朗斯基公式是产业地域分工的必要条件。上文曾用 $\left(\frac{C_i^{(k)} + T_j^{(k)}}{U_i^{(k)}} \right)$ 来量度产业的

区位优势,它的地域分异是产业地域分工形成的前提之一。我们说任何一种(或一类)产品的生产要素和市场区位在空间上的差异总是存在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的类别愈来愈多,并各有特色(如名牌产品的出现,新型产品问世等)。在一定时间, $\left(\frac{C_i^{(k)} + T_{ij}^{(k)}}{U_i^{(k)}}\right)$ 越小,商品或物资交流的概率会增大,空间经济相互作用会增强,与此同时,生产活动在空间上亦会更趋近于新的有序。从内含变量来看,即由于 $C_i^{(k)}$ 和 $T_{ij}^{(k)}$ 的变小和 $U_i^{(k)}$ 的变大,通过系统各层次的自组织,会走向动态平衡的有序化。可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改善交换、运输和通讯条件,对人类生产活动的空间扩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任何一个地域单位都有朝着部门产品齐全发展的趋势。这一则是因为它促进在小范围内节约社会劳动,二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有机构成的提高,古典区位论的原则对朝阳工业的制约日见其小,使决策加强了上述感应。根据信息论的负熵原理,地域系统的组织水平愈高,则该系统向外传递的信息愈少,熵值愈低。但是,系统是由不同层次的经济地域单位组成的。在多区组成的主系统中,其子系统经过规划、结构和布局趋于最优,使它们的熵值减低;但这样一来,由各区组成的主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就要变劣,即熵值增加。因此,就全局的生产力地域组合来说,系统的优选标准应是:

$$\{\Delta H_{\pm}\} - \left\{ \sum_{\tau=1}^n \Delta H_{\tau} \right\} \rightarrow \text{最低值}$$

式中 ΔH_{\pm} 是主系统通过规划布局的增熵量, $\sum_{\tau=1}^n \Delta H_{\tau}$ 是各子系统通过规划布局的总减熵量。由此可见,单纯考虑全国或大区利益的一盘棋思想,仅考虑地方利益的大而全或小而全思想,都是站不住脚的^[6]。至于脱离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的分析计算,强调全国或地区内的生产力布局的平衡发展,如五十年代苏联某些经济学家的提法,更是超理想主义的了。这同国家或省市用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正确政策并不是一码事,只不过是把一时措施简单地看作经济机制而已。

总之,地域分工是由人类经济活动本身不断演化所产生的区位优势所致。地域分工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结构,与区位优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关系。地理学,特别是区域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必须在发扬外在因素分析的同时,加强内在机制的研究,才能逐步建立起地域分工和区位优势方面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大量区域开发和城市规划的实践任务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参 考 文 献

-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1974。
- [2]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 [3] 陈振汉、厉以宁,工业区位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
- [4] 孙祥剑,斯密和俄林的地域分工理论,城市和经济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 [5] H. H. 巴朗斯基,地理分工,经济地理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
- [6] 杨吾扬,经济地理学的性质、任务与方法论,中国地理学会一九七八年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
- [7] 朱德威等,区域(或城市)的投入产出模式介绍,中国地理学会一九七八年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
- [8] R. Huggett, Systems Analysis in Geograph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 [9] P. M. Allen and M. Sanglier, Urban Evolu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1, 13.
- [10] 范家骥, 国际贸易理论, 人民出版社, 1985。

THEORIES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LOCATIONAL SUPERIORITIES

Yang Wuya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Peking University)

Liang Jins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Key words Territorial division; Locational superiority; Absolute advant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lative price; Inherent mechanism; External factor

Abstract

There exists an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superiority. The former is the objective scheme and the latter-motive Cause from human being. To define locational superiorities of a region or a city, we must, first of all, determine its economic status in a specific area.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ly, a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theories and secondly, the presentation of a full system on locational superiorities of region and city. Finally,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areal differentiation is probed.

The founder of classic political economy—Adam Smith initially explored the benefit of social division and territorial division. He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absolute advantage to explain commodity exchange between places and countries in the 18th century. Smith laid undue stress on absolute high productivity or low cost as prerequisites for specialized production, thus a backward region or country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close its area to external trade. David Ricardo, another classic economist and a disciple of Smith, elucidated the labor value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Mutual trade can still occur to two regions or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wedish economist Bertil Ohlin advanced his relative price differentiation to explain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n the basis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The inequilibriu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ve factors results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lative price of goods, which leads to the price difference of commodities, thus interregional or international trade come into being. In terms of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e price, Ohlin set up the theor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eneral locational theory. Soviet economic geographer N. N. Baransky, using Marxism, analysed two original factors for social and territorial division—the differentiation from human being and its habitat. He maintained that economic advantage is the motive power of geographical division, and also emphasized the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and tariff. Baransky's formula for geographical division is as follows:

$$C_p > C_p + t$$

Here C_v stands for the price of commodity at selling place, C_p for the price at the place of production, and t for freight.

So far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a region or an urban area is concerned, the core issue is how locational superiority can be determined. Economic superiority possesses very distinct aspects and a complex struc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a superiority syste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macrolocational theory. It consists of four pairs of regional or urban predominance (locational superiority):

1.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2. absolute and relative;
3. partial and overall;
4. spatial and timely.

the authors bring to light the nature of each pair of locational superiorities by means of contrast and expound their inherent mechanisms by applying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t is worth to further discuss the combination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locational supe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economy. We have just begun our work in building model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planning. Much more is expected to done in the near future.